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

中國文化 發展史

总主编
龚书铎

先秦卷
廖名春 主编

山東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國文化 發展史

总主编
龚书铎

先秦卷
廖名春 主编

山東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发展史. 先秦卷/龚书铎主编;廖名春分册
主编.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
ISBN 978—7—5328—7930—4

I. ①中… II. ①龚… ②廖… III. ①文化史—
中国—先秦时代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7982 号

总 策 划/陆 炎
责任编辑/陆 炎
装帧设计/石 径

中国文化发展史

先秦卷

龚书铎 总主编

廖名春 主 编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4 传真: (0531)82092625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36.75 印张
字 数: 6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7930—4
定 价: 91.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539—2925659

201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目 录

导论 文明的演进 / 1

第一章 多元而一体 / 4

- 一、中国文化起源之谜 / 5
- 二、多元一心的新石器文化 / 17
- 三、传说时代的部族区域文化 / 28
- 四、周秦区域文化 / 39
- 五、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初步形成 / 53

第二章 酋邦与早期国家 / 59

- 一、酋邦与等级、专制制度的发生 / 59
- 二、早期国家的社会制度（上） / 69
- 三、早期国家的社会制度（下） / 79
- 四、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转化 / 92

第三章 思想传统的奠定 / 102

- 一、前诸子时代的思想与学说 / 102
- 二、儒学 / 114
- 三、墨学 / 132

- 四、道家 / 140
- 五、阴阳家和黄学 / 151
- 六、法家 / 159

第四章 汉语的早期面貌 / 166

- 一、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 166
- 二、汉语的早期特色 / 189
- 三、诸子的语言理论 / 214

第五章 文学艺术娱乐的草创 / 227

- 一、文学思想的萌生 / 229
- 二、诗歌总集——《诗经》 / 238
- 三、屈原与宋玉 / 250
- 四、上古神话和散文 / 267
- 五、艺术与娱乐 / 276

第六章 战争和兵学的渊源 / 288

- 一、战争的起源和发展 / 288
- 二、兵制的发展 / 292
- 三、兵器的演进 / 305
- 四、战争形式的发展和战术的变化 / 318
- 五、兵学与兵家 / 331

第七章 从官学到私学的兴起 / 343

- 一、教育的起源 / 343
- 二、学在官府 / 357
- 三、私学与士 / 383

第八章 科技文明的初曙 / 410

- 一、天文、历法 / 410
- 二、数学知识的积累 / 415
- 三、医药、传统医学理论的确立 / 420
- 四、生物学知识的形成 / 425
- 五、物理学知识 / 428
- 六、地理学的初创 / 436
- 七、自然观与科学观 / 439
- 八、农牧业技术 / 444
- 九、手工业技术 / 449
- 十、灌溉与堤防工程技术 / 456

第九章 先秦的社会生活习俗 / 460

- 一、衣食住行 / 460
- 二、婚姻 / 486
- 三、丧葬 / 498

第十章 先民的宗教信仰和方术 / 507

- 一、宗教信仰 / 507
- 二、以卜筮为代表的方术 / 520

结语 先秦文化的鸟瞰 / 566

主要参考文献 / 577

后记 / 581

导论

文明的演进

先秦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时段。其下限为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其上限则至史前，具体到哪里，是难以说清楚的。

史家一般将先秦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史前时期，指有文字记载以前的时期，亦称古史传说时代，其大部分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二是史籍所载夏商周（包括西周、春秋、战国）时代。先秦史的研究一般都以第二阶段为重点。第一阶段的研究，“文献不足征”，主要依靠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而第二阶段的研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历史考古学，包括其分支古文字学，但由于已有系统的文献记载，属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因此，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印证，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研究与田野考古相结合，则成为其基本的方法。

先秦文化史的研究与先秦史的研究基本是同步的。因此，本卷所写的先秦文化史，主要侧重夏、商、周（包括西周、春秋、战国）时代，对于史前时期，除了追溯和对比外，我们一般都较少论及。即使是对于夏、商、周（包括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材料的关系，我们也是略远详近。对先秦文化发展水平的评估，一般也是以后出的春秋、战国作为代表。在史料的处理上，我们基本上以文献记载为主，文献记载不足的则补之以考古材料。当然，在利用传世文献时，我们也要尽可能地以出土材料去印证；在利用考古材料时，也不能忘记古史传说的作用。

先秦文化发展的历史，是一个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进程。古人视上古为黄金时期，以为愈古愈好。其弊今天应该人所周知。但是，近代以来乌托邦思想流行，过分肯定“大同”，憧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但违背人性，也是反历史，反文明的。我们的先秦文化史，揭示的是先民文明演化的过程及其规律，自然要打破愈古愈好的崇古观念。所谓“上古竞于道德，当今争于气力”，其实应该反过来说，是愈古愈争于气力，愈后愈竞于道德。迷信武力，一决于强权，是动物本能的表现。而人的进化，应该动物本能愈来愈淡化，文化性愈来愈强。所以，人的历史应该是一部文化史，而不应是一部武化史。侧重于先民理性的提升和知识的进化，而不是一味纠缠于人与人的政治争斗，从这一角度来表现我们先民的历史，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从纵向的比较看，今胜于昔。特别是今天科技发达，各种制度趋于成熟，学术理论日新月异，人们很容易以今傲古。但从横向的比较看，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比如我们今天的科技发展水平，与当今世界各国比，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而春秋战国时代的科技，在当时的世界上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两相对比，最能说明问题。对先秦文化发展的评价来说，横向的相对比较较之纵向比较更有意义。我们写先秦的思想、学术、艺术、教育、科技等等，叙事是纵向的，评价则应该是横向的。有许多从纵向角度看似乎很了不起的东西，横向一比较，并不那么了不起；有许多似乎不起眼的东西，横向一比较，意义则了不得。因此，坚持横向比较的原则，是我们避免厚今薄古的浅薄，客观反映先秦文化发展水平的必然。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时代，这是先秦文化发展史的一个最大特点。

其后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化，她的基本精神、基本结构、基本走向，在先秦时期已经定型。比如长期以来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先秦时即已初步完成；长期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先秦时即已成形；汉语、汉字的基本特点，先秦时即已具备；后来诗歌散文的形式和内容的一些主要方面，先秦时已有雏形。后来人们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艺术欣赏，甚至思维方式等等，都由先秦一脉相承而来。

先秦时期又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经典都产生于先秦。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界，能与孔子、老子比肩的思想家，可谓少之又少。像先秦诸子那样百家争鸣、大家辈出的黄金时代，后来也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及。其后的两千多年来，兵学上尽管有诸多名家，但与孙子争胜，恐怕也只能是自叹弗如。因此，先秦不但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时代，在诸多领域里，更是高峰，甚至是巅峰的时代。

与后来的各个文化阶段相比，先秦文化的差异性也更为突出。先秦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演变过程，它的终点和后来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接近，但其它则相当不同。比如先秦时期的“家”，与后来传统社会的“家”，有本质的区别。先秦时期的“民”，与后来“编户齐民”的“民”，性质也有不同。先秦的甲骨文、金文、战国古文与后来隶书、楷书等，虽然有源流关系，但认识隶书、楷书的，就不一定认识先秦时期的甲骨文、金文、战国古文。这种差异性，给我们正确认识先秦文化造成了诸多困难。因此，写先秦文化史，较之写其它各个阶段的文化史，应该说难度更大。

本卷拟从多元而一体的文化格局、社会制度文化、思想学说、汉语汉字、文学艺术、兵学、教育、科技、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方术十个方面来反映先秦文化的发展演变。但事实上这十个方面难以反映先秦文化的全部，我们也只是勉力而为。至于理想的先秦文化史，只能有待于来日了。

第一章

多元而一体

中国文化的起源，长期以来都是最引人注目的中心话题。随着考古材料的大量发现，经过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中国文化起源问题，越来越明朗。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文化有多个起源地；新石器中期以后，逐渐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汇聚起来；到秦始皇统一天下，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为了清楚扼要地展现中国文化的起源和融合进程，本章分为五个部分，着重介绍中国文化起源的本土论和外来论之争、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先秦时的部族区域文化、国别区域文化，以及秦始皇对中国文化一体化的贡献。

一、中国文化起源之谜

中国人从哪里来？中国的国家和民族是如何形成的？至今，这些有关中国文化起源的问题依然是难解的谜。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探索中国文化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至今方兴未艾。中国文化起源的研究，曾经长期围绕本土说和外来说的争议展开。

探索中国文化起源，从一开始，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中国文化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其他文化迁徙派生的？1921 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了后来号称“彩陶文化”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这之前，西方学者一直认为中国没有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使这一说法不攻自破。仰韶文化的发现再次引发了中国文化起源的本土说和外来说的争议，自此，中外考古学者试图通过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在仰韶文化发现以前，中国文化起源的本土说和外来说之争就存在，不仅西方学者大都提倡外来说，某些著名的中国学者也相信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他们主要是通过文字、语言、风俗、制度等方面的异同进行论证。仰韶文化的发现是本土说和外来说之争的转折点，笔者以此为界把本土说和外来说之争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仰韶文化发现以前，即 1921 年以前，外来说的种类众多，说法不一，论证方法是比较法，尤其是文字的比较，几乎每一种外来说都以文字的类似作为主要论据，在论证中，猜测比附的成分很大。后期，仰韶文化发现以后，即 1921 年以后，外来说集中单一，论证方法是考古学的一系列方法，以考古新发现作为论据，结论也随着考古发现的更新而不断修正和发展。

（一）文字语言学阶段：仰韶文化发现前

仰韶文化发现以前，即 1921 年以前，是本土说和外来说之争的前期。这一时期，外来说的种类众多，五花八门^①，有埃及说、巴比伦说、中亚说、印

^① 说法越多也就越能证明，各说都没有足够可靠的证据使人完全相信。

度说、印度支那说（缅甸）、新疆说等等。此期的本土说，主要是建立在批驳外来说的基础上。

埃及说是最早出现的外来说。17世纪中叶，德国耶稣会教士基尔什尔（A. Kircher）先后在《埃及迷解》（*Cedipi Aegyptiaci*, 1654）、《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 1670）中提出“中国人是埃及人的苗裔”。之后，法国主教胡爱（Huet）、法国人德基涅（M. de Guignes）和英国人维尔金森（G. Wilkinson）支持并补充了这一说法。他们的主要论据是：（1）中国文字与埃及文字相类似，中国象形文字是腓尼基字母组合字；（2）圣经说“含的子孙在中国建立了殖民地”；（3）古埃及商业悠久发达，中国人和古埃及人有相似的风俗习惯；（4）1834年，在第伯斯（Thebes）的埃及古墓中发现了中国瓷瓶^①。可见，埃及说是通过文字、语言、风俗、制度等方面的相类，甚至是圣经中的字句，以简单的比较加比附，穿凿附会，令人难以相信。这也是前期外来说的共同特色。

巴比伦说是影响最大的外来说。1851年法国人皮奥（E. Biot）在《周礼导言》中首次提出。此后，法国人查默斯（J. Chalmers）、法国汉学家波提埃（M. G. Pauthier）和卢内尔曼、英国学者拉克伯里（T. de Lacouperie）、日本学者白河次郎和国府种德等支持并补充了这一说法。和埃及说一样，巴比伦说的最主要论据也是语言和文字，方法也是简单的比较法。查默斯《中国人的起源》（1866年）将古代各种不同的语言相比较；波提埃和卢内尔曼将汉字和楔形文字比较；拉克伯里《中国古代文明西源论》（1894年）在比较中国和古巴比伦的文字、历法的基础上还假设了一条黄帝为首的中国人祖先的迁徙之路；白河次郎和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1899年）列举了七十多条中国与巴比伦在学术、文字、政治、传说等方面类似处。和埃及说不同的是，巴比伦说在中国影响广泛，不仅有黄节、章太炎、刘师培、丁谦等名家撰文比附，而且激起了本土说和外来说的争论。自从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将拉克伯里的巴比伦说介绍到国内后，黄节、章太炎、刘师培等学者沿着拉克伯里的假说争

^① 这个所谓的“中国瓷瓶”曾引起许多争议，但最后却被证明并非出土于埃及古墓，而是出自“阿拉伯人的恶作剧”。转引自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6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相比附。黄节《种源论》认为巴克是盘古的讹音。章太炎《序种姓篇》认为：“加尔特亚盖古所谓葛天。”刘师培《国土原始论》认为喀尔迪亚是神州民族的发祥地。丁谦《中国人种从来考》也认为盘古是移住中国的始祖。批驳此说的中国学者以何炳松与缪凤林为代表。何炳松的《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26卷2号）认为此说是“西洋新撰之《山海经》”。缪凤林在《中国民族由来论》（《史学杂志》二卷二、三、四期）中，指出此说有五点错误：（1）地理阻碍；（2）人种不同：巴比伦属白种人，中国人属黄种人；（3）年代悬殊：中国人居住时间至少在数万年以上，而巴比伦原始住民由外迁入距今只有七八千年；（4）文物各异：中国的殷墟甲骨、八卦、琴瑟是巴比伦所没有的，而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泥版书、史诗、建筑、美术、星期制等也是中国没有的；（5）证论不确：如楔形文字即八卦，巴克即百姓，萨尔功即神农、鸟包即伏羲、廓特奈亨台即黄帝等等比喻都不伦不类，荒谬绝伦。批驳此说的外国学者有沙畹（E. Chavannes，法）、夏德氏（F. Hirth，德）等。沙畹从语言学上证明熊黄帝说之误。夏德氏在《中国上古史》中力驳拉克伯里的假说为穿凿附会，不足为凭^①。

其他的外来说在中国的影响很小，核心内容都是认为中国存在一个移民时代，并各自假设了迁徙途径。1853年，法国人哥比诺（A. de Gobineau）提出了印度说。他认为，中国文化是由印度英雄时代后的白色雅利安种之首陀罗人传入的，而中国神话中的盘古就是印度民族迁入中国河南的一个酋长。1872年，俄国院士B. 皮·瓦西里耶夫在《中亚语言与古汉语的关系》一书中，通过对中亚语言与古汉语的比较，得出中国人源于中亚的结论。瓦西里耶夫的中亚说由他的学生C.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美国考古学家攀伯里（R. Rumpelly）和法国学者边伊（S. Bailly）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他们除了根据语言文字的相似外，还根据安诺（Anau）及墨夫（Merv）两地古遗址的发现，推论人类应发生于中亚细亚，乃因其地变干而东迁，一支入巴比伦，一支入中国。另一种外来说，印度支那说，也被称为缅甸说，是维格尔氏（C. Wiegner）提出的，后来自动取消。此说假设了中国人从缅甸到中原的迁徙路径：由八莫

^① 参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又参见林惠祥：《中国民族史》，50～54页，上海书店，1984。

(Bhamo) —莫猛 (Momein) —大理—洞庭湖—中原。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外来说认为,中国人(汉族)不是在中原土生土长的,而是从新疆迁徙来的,塔里木盆地是中国人的发祥地。这种新疆说是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 Richthfen)提出的,曾一度被安特生采纳。

此期也有些西方学者主张本土说,他们通过批驳种种外来说的不合理建立本土说的合理性。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罗索密(Leon Rossony)、威尔斯(Wells)、约翰·洛斯(John Ross)等。约翰·洛斯不仅批驳了所有以文字相似为主要依据的外来说,否认汉民族有移民时代,而且还认为,其他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相似因素的原因正是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影响的结果^①。

(二) 考古学阶段: 仰韶文化发现后

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文化后,提出了新的西来说,本土说和外来说之争进入后期。仰韶文化的发掘是探索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大转折,标志着研究中国文化起源问题新的阶段——考古学阶段。这之前,无论是外来说还是本土说,都是使用文字和语言材料,以文字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起源问题。可以说,仰韶文化发现前,是探索中国文化起源的文字学阶段。仰韶文化的发现,不仅证明了中国有新石器文化,而且显示,以考古学材料和方法解决中国文化起源问题更科学、也更有可能。此后,学者们都使用考古学材料和方法证明他们的本土论或外来论,研究中国文化起源问题进入新阶段:考古学阶段。至今为止,考古学方法依然是探索中国文化起源的最有效方法,不断发现的考古材料使中国文化起源之路越来越清晰可见。

安特生发掘仰韶文化之后,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与中亚安诺文化和特里波列文化的陶器在器工花纹方面很相似,于是,他推断“仰韶陶器中,尚有一部分或与西方文化具有关系者,近与俄属土耳其斯坦相通,远或与欧洲相关”,并说:“吾人就考古学上证之,亦谓此著彩之陶器,当由西东来而非由东西去也。使他日可证明制陶器之术来自西方,则其他文化或种族之特性,亦可由此

^① John Ross,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people, London, 1916, p. 8. 转引自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6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输入。”^① 他认为中国新石器文化是从两河流域与中亚等地传入，途经新疆、甘肃，进入河南。安特生新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在西方影响很大。但是，随着考古文化的不断发现，安特生的西来说越来越难以成立，最终安特生本人也放弃了这一说法^②。



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分布图

安特生的假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中国考古材料太少造成的。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考古新发现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发掘的新石器文化已经如“满天星斗”，即便是旧石器文化遗存也遍布中华大地。仅仅是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文化“就注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彻底破产”^③，而旧石器

①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载《地质汇报》第五号，1923年。

② J. G. Andersson,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p. 24, 1968. 转引自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载《考古》，1985（5），457页。

③ 安志敏：《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文化》，载《考古学报》，1987（2）。在文中，安志敏详细分析了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文化之后，得出结论“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它们是这里的土著，同中国东部的新石器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与黄河流域的早期文化息息相关。就注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彻底破产。”

文化和新石器文化遗存整体面貌更证明，中国文化是土生土长的。

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旧石器文化遗存不仅分布广泛，而且有完整的进化序列，证明中国人种很有可能就是在本地进化的，而并非是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的。从旧石器文化遗存看，至今已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有二百多处，除福建、新疆两地以外，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各个省区，都已找到旧石器遗迹^①。中华大地最早的旧石器遗迹是距今 180 万年的西侯度文化。1960 年，在山西芮城西侯度村早更新世地层中发掘了石制品 32 件，以及有切割痕迹的鹿



旧石器时代打砸器

角、烧骨和大量动物化石^②。西侯度文化证明，至少在 180 万年前，中华大地上已有了人类的足迹，此时正是地质史上更新世带，即早期龙川冰期以后的时代。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不仅发现了更新世居民的踪迹，而且还发掘了更新世的人类化石。1965 年，在云南元谋发掘了两枚猿人的牙齿，据检测，距今约 170 万年，是中国至今所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在直立人之后，人类进化还要经历早期智

人和晚期智人两个阶段。这些进化阶段的人类化石在中国都有大量发现，它们不仅有着共同的特征，而且在体形体态和时空分布上都显示出进化上的连续性。中国发现的直立人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等。距今 10 万年至 4 万年前，早期智人有金牛山人、大荔人、马坝人、许家窑人、长阳人、丁村人等。在中国发现的晚期智人比直立人和早期智人更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山顶洞人、河套人、柳江人、左镇人、榆树人、下草湾人、资阳人等。这些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有着蒙古人种起源与演变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特征。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② 参见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